

# “大党独有难题”及中国共产党的破解之道<sup>〔\*〕</sup>

杨玉城,张振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政治命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主动与战略清醒的政党品格,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通往文明与政党双重意义上“可大可久之政治”的行动路径。“大党独有难题”生成于由政党组织建设问题、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问题与政党联系社会问题所构成的政党政治“基本域”,具体表现为“大党”规模治理难题、长期执政难题与代表性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表现为空间维度上面临多重规模因素的叠加压力,时间维度上呈现为复杂状态下的长期执政,政党之“政”维度上需调节“部分”“整体”的互契张力,政党之“治”维度上则要实现超大规模政党的严格治理。破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原则、价值、组织、制度等维度建构“四大治道”,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遵循,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引领,以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为组织保证,以坚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为制度保障。

〔关键词〕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破解之道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4.010

## 一、引言：“大党独有难题”与“可大可久之政治”

“可大可久之政治”,是全部政治共同体意欲达到与不懈追求的目标。从世界历史看,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特质就在于其具有“统一性”,实现了大规模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政治稳定的长期维持。<sup>〔1〕</sup>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型政党”,<sup>〔2〕</sup>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构成了“中国政治形态的决定性因素”。<sup>〔3〕</sup>在

这一逻辑规定下,中国共产党就成为构造与展开中国“可大可久之政治”的核心力量和关键主体。正因如此,如何实现“可大可久之政治”的问题,就转换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如何形成一套通往“可大可久之政治”的有效机制,从而达成与国家、民族乃至文明“可大可久之政治”目标的互契与耦合。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如果自身难以探索出一条“可大可久之道”,也就无法承担起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重任。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者简介:杨玉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振,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总体逻辑及实现机制研究”(22&ZD020)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sup>[4]</sup>“大党独有难题”这一崭新政治命题的提出,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主动与战略清醒的鲜明政党品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揭橥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可大可久之政治”目标的深刻认识:以破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为基点,使“大党”达到空间中的规模统一和时间上的持久稳定,从而实现政党理想,由此塑造与达到政治文明高度上的“可大”与“可久”。针对“大党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六个“如何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进行了深入地回答,为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科学指导。<sup>[5]</sup>那么,从政党原理来看,“元问题”层面的“大党独有难题”是什么?基于此,由一般走向特殊,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有哪些主要表征?中国共产党在难题生成与识别难题的过程中如何应对与破解?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回答,有助于理解与把握“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与外延,开拓“大党”及其独有难题的研究视野与空间。

### 二、“大党”与“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释义

“大党独有难题”是“大党”这一特殊政党类型所面临的特定问题或议题。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相互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sup>[6]</sup>就此而言,理解“大党独有难题”不仅要厘清“大党”的概念,而且应从政党及政党政治原理层面去加以探究。

#### (一)“大党”:一个政党类型的探讨

“大党”属于政党范畴,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大党”显然又是一个政党类型,是政党概念中的一个子集,具有特殊属性。但无论是日常生活的语用,还是学理层面的运用,“大党”的概念

以及具体划分标准都较为模糊。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大向度:

1. 规模向度。这一向度重在考察政党的外在特征,将政党的党员、党组织数量作为划分“大党”的标准,即拥有党员数量多和党组织规模大的政党可以称之为“大党”。但从规模向度考察,“大党”也有“绝对大党”和“相对大党”之分。“绝对大党”是指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绝对大的规模,如一党制国家的某一政党会天然具有绝对大的政党规模;而“相对大党”是指某一政党党员数量和组织规模在本国多党并存的政治环境中呈现出一党独大态势,或者相对于世界其他政党而言规模比较庞大。<sup>[7]</sup>此外,“大党”规模形成与扩张的方式也会成为人们判断的标准之一。有些“大党”规模扩充方式极为简易和宽松,甚至只要打一个电话、填一张表格就可成为该党党员,故而严格来说,这些政党很难称之为“大党”。<sup>[8]</sup>

2. 时间向度。这一向度将政党存续时间、执政时间乃至历史影响力作为衡量“大党”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至世纪之交,世界上一批各种类型的政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而这些政党的共同特征在于其“在本国国内长时间占有较大优势”且“单独长期执政”,<sup>[9]</sup>同时政党存在的时间都已较长。因此,人们常从反思历史经验的角度将“大党”“老党”并列,形成一个约定俗成、具有特定意涵的政治术语,比较典型的“大党老党”包括但不限于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以上“大党老党”存在时间都比较长,在本国或本地区内执政时间也比较久,同时对本国或本地区发展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些则在国际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3. 功能向度。这一向度重在考察政党内在质量,将政党党员整体素质和组织能力作为衡量“大党”的标准。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政治时就指出:“被我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一般说来,同其他政党

相比,它们的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爽快和勇敢。”<sup>[10]</sup>在这里,“大党”与功利性政党相对,是坚持政党原则、重视政治理念的政党。进而言之,从功能向度去理解“大党”更关注政党的某些突出特质,如这类政党能够坚持自己的政党原则与意识形态,具有较为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较为健全的组织结构体系、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较强的执政或参政能力。<sup>[11]</sup>可见,从功能维度去理解“大党”带有较强主观性,“功能强大”甚至“理想大”“责任大”等因素也可以纳入评价标准。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大党”划分的标准涉及多个向度,即使是从规模和时间这两大相对客观的向度来理解“大党”,也难以确定一个绝对的、具体的量化数值。为此本文认为,广义上的“大党”是指党员人数较多、组织规模较大的政党;狭义上的“大党”是指政党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组织复杂性)且执政时间较长,同时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党。<sup>[12]</sup>本文着重从狭义层面来探讨“大党独有难题”。

### (二)“大党独有难题”:生成与表现

放眼当今世界,“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sup>[13]</sup>但无论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制度体制如何,政党在本质上都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取得和巩固国家政权而活动的政治组织”。<sup>[14]</sup>由此而言,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面临着以下议题:一是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如何确立独立的组织价值、组织目标、组织体系、组织规范并拓展与政治共同体相宜的组织规模、实施恰当的组织行为和进行一定的组织管理等,以确保政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是政党如何取得、执掌并巩固国家政权。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控制国家政权”,<sup>[15]</sup>这构成了政党政治的核心问题。三是政党作为一定社会阶级或者阶层的政治组织,该如何争取、维护和发展包括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在内的社会整体利益。由此,政党组织建设问题、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问题与政党联系社会问题等

三大议题构成了政党政治“基本域”。在政治实践中,各类政党会遭遇各种现实难题与挑战,形成了以政党政治“基本域”为中心的“问题簇”。“大党独有难题”是“大党”这一特殊政党类型存在或面临的若干议题或问题,并没有脱离政党政治“基本域”,但正是由于“大党”独特政治因素或者变量的引入,使得一般性的政党“问题簇”具象化为“大党独有难题”(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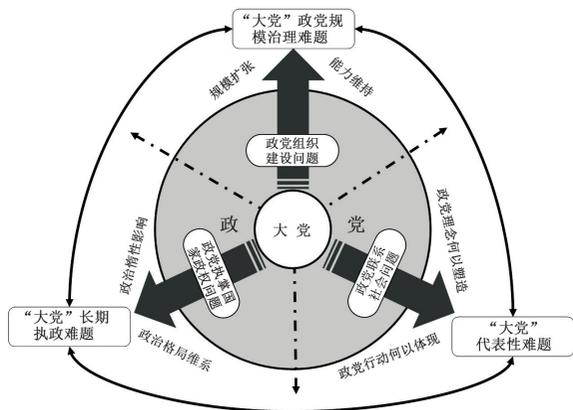


图1 政党政治“基本域”及“大党独有难题”表现

1. “大党”的政党规模治理难题。“大党”相对一般政党,已具有一定的组织成熟度,政党规模较一般政党要更大。“大党”在形成较大规模以及持续扩张的过程中,对内对外能够汲取更多资源,从而形成正向的规模优势和规模效益,但也会出现“规模效益递减”或“规模效益不经济”现象,即随着大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巩固、党的组织规模不断加速地扩大,其党力却反而逐渐呈现出衰退、弱化的趋势”。<sup>[16]</sup>如苏共在拥有20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是在党员人数达到近2000万时,党的队伍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却逐渐腐化变质,整体“党力”并非表面显示得那么强大,最终仍丧失了长期执政的地位;又如东欧共产党中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其党员数占人口比重一度达到16.1%,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罗共政权摇摇欲坠时,党员却早已作鸟兽散。<sup>[17]</sup>当然,这并非是说政党规模越大,政党功能一定越弱甚至一定会垮台,事实上,政党规模与政党功能并不具有强相关关系,规模小的政党并非就

是“弱党”，规模大的政党也并非一定为“强党”。但是从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长期执政失败的惨痛教训可知，如果“大党”任由自身继续“虚胖”而忽视政党整体功能强化，则可能引发政党乃至国家的衰败。因此，“大党独有难题”的首要问题，便是“大党”如何通过提升政党治理的有效性来克服政党规模持续增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2. “大党”的长期执政难题。在某一时间段内，“大党”业已达成“获得国家政权”这一阶段性政治成果，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继续长期保有国家政权，提升执政绩效，夯实执政合法性，达成政治秩序在时间中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以实现“可久”的政治愿景。一方面，就政党执政规律而言，“大党”会遭遇一般政党均会遇到的困境，即“任何一个政党在参与政治、影响甚至控制社会和政府的过程中，其能力都有一个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过程，这可以称之为政治惰性”；<sup>[18]</sup>另一方面，就本国的政党体制而言，“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如何保持相较于其他政党或政治力量的政治优势，延续其在政治制度体制中的主导格局，也是“大党”要面临的特殊难题。历史地看，在多党制国家内，如曾创造“墨西哥奇迹”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丧失执政权后，“一党独大”或“一党独尊”格局不复存在；在一党制国家内，苏联共产党主动“革新”党的领导体制和政党体制，由一党制转为多党制，加速了苏共的瓦解与苏联的解体，苏共甚至由合法执政党沦落为“非法政党”。即便有的“大党”东山再起、重掌政权，也难以恢复或再次建构“以己为优”“以己独大”的力量格局。因此，对于“大党”而言，提升长期执政能力以及保持自身在体制中的政治力量优势的现实压力更为巨大。

3. “大党”的代表性难题。任何政党都是一定社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代表者，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代表”，而是要将“这些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达、反映出来”，并把其“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

变成党的政策主张”。<sup>[19]</sup>可见，政党代表性集中体现在政党理念和政党政策这两大方面。执政党掌握的是“公共权力”，而角色的定位和权力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执政党的政党理念及政策要在维护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前提下，实现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大党”的超大规模和长期执政两大属性特征，对其政党代表性提出了更艰巨任务：一是在价值层面，“大党”的政党理念及政策如何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真实准确地反映时代与人民的现实要求。在“大党”衰败消亡的历史中，政党理念或政党政策调适失当的案例屡见不鲜。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弃与背离以往所坚持的“革命民主主义”，代之以实质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和“新民族主义”，但这些调整“均背离了墨西哥革命的宗旨，过分强调经济自由，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导致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社会贫困化日益加剧”，<sup>[20]</sup>造成了党内的分裂并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最终不得不吞下执政71年后丢失政权的“苦果”。二是在行动层面，“大党”如何克服削弱政党代表性的各种因素，始终忠实践行政党理念、有效执行政党政策。政党的代表性关键要在政党的实际行动中加以维护和保持。“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有些“大党”虽然一直标榜自己代表本阶级、阶层乃至全体人民的利益，但其实际行为早已与其所宣称的理念背道而驰，自我销蚀了其“安身立命”的政党“旗性”与政治合法性。

以上三大“难题”是综合了“大党”特征并在遵循政党政治“基本域”下推导而出的，这并不是说“大党独有难题”仅指这三大方面，而是“大党独有难题”以这三大问题为核心议题。

### 三、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的主要表征

从规模维度上看，中国共产党现已拥有9671.2万名党员和493.6万个基层组织（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sup>[21]</sup>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共产党也已执

掌国家政权七十余年,并已有百余年政党历史,可谓是“百年大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实则为“大党”中的“大党”,但“大也有大的难处”,<sup>[22]</sup>其“大党独有难题”也更为复杂,并呈现出相应的特殊表征。从政党政治“基本域”与“大党独有难题”的一般表征出发,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在空间(“大”)、时间(“久”)、政党之“政”、政党之“治”等四大维度具有特殊性。

(一)空间维度的特殊性:多重规模因素的叠加压力

政治视域中的“规模”常被视为影响政治共同体实践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大党”与“大国”所赋予的“多重规模因素”,即“大党”的超大政党规模与“大国”的超大国家、超大社会的先天规定性规模,而这些规模因素在同一空间与时间内“累进叠加”的情形,鲜见于其他“大党”。从一般意义上讲,“超大规模”可以形成显著的“规模优势”,如“人多力量大”;却也能形成棘手的“规模难题”,如“大有大的难处”。多重规模因素的“累进叠加”,客观上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构成了十分突出的“叠加压力”。

中国共产党是超大型政党,仅党员人数就已经远超很多国家的人口总数,因此“党员人数众多、机构建制庞大、组织规模超常,治理难度很大”。<sup>[23]</sup>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治理的国家亦不是一般规模的国家,而是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超级大国”。应当说,“大国”的超大规模并非治理主体可以主观地加以选择,而是必然要面对的“先天禀赋”或客观规定性因素。党的二十大精准识别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有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规模”因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sup>[24]</sup>其实,在国家治理视域中,“中国国土规模和人口数量可以说是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无时不在的一个约束条件”,“治理规模所导致的组织复杂性和沉重负荷是无法避免的挑战”。<sup>[25]</sup>具体而言,超

大国家与社会的治理规模可能引发“大党”的“治理负荷焦虑”,包括超大社会存在多样化事实与紧张关系的“差异性焦虑”、维护国家统一秩序的“离散型焦虑”、对社会事实的有效测算和调控的“监控型焦虑”以及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品质的“服务型焦虑”。<sup>[26]</sup>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理念、适当的技术有效缓解因超大政党、超大国家与超大社会规模所形成的“叠加压力”,在政党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到通往空间维度的“可大”路径,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二)时间维度的特殊性:复杂状态下的长期执政

一定空间规模的政治生成之后,便面临着如何在时间维度上维持稳定、实现理想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崭新的国家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巩固领导地位、确保长期执政的政治“可久”问题愈发重要。相较于其他“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长期执政有着相对特殊的要求。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并非仅是所谓的政党本性驱动,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使命与责任意识,为了权力而掌握权力,将权力的占有和支配视为自身存在的唯一的根本目的,注定被强大的权力所异化而作茧自缚,最终走向衰落。”<sup>[27]</sup>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肩负着民族国家历史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阶级本身的消灭”两大历史使命,<sup>[28]</sup>这规定了中国共产党要通过长期执政这一政治过程去达成远大的政治理想。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轮流执政”或部分国家“一党独大制”下的长期执政,是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的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自我构建性权力”,“天然地超越、独立于既有权力体制和各种社会力量,

拥有高度自主性,甚至是‘绝对’的”。<sup>[29]</sup>就此而言,党的领导权是党的执政权的前提条件,党的长期执政,离不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但党的全面领导也要通过党的执政权的有效运转来确保其发挥实效。因此,这一深层政治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处理好执政与领导、执政权与领导权的辩证统一关系。此外,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是通过长期革命获得的,因此随着执政环境的深刻变迁,“大党”还要面临执政与领导方式“现代化”的问题。<sup>[30]</sup>同时,党在长期执政中防范与应对风险性因子突现、不确定性因素积累效应的任务也更为艰巨。由上可见,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既受政党与国家政权勾连的本性规制,又要遵循政党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使命,同时还要妥善处理或优化政党历史带来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惯性”,这些历时性与共时性因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复杂限定条件。

(三)政党之“政”维度的特殊性:“部分”“整体”的互契张力

政党之“政”,即政党的“政治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是政党属性的“一体两面”,两者相互交融,但政治性更具根本性。<sup>[31]</sup>政党的政治属性实质上包含了“反映社会”与“整合社会”的功能,联通了“部分”与“整体”。政党从本义上讲就是“部分”,但应当“作为整体的部分”,从“社会整体”反映自身所代表的“部分”,努力在“派性和整体控制”与“党的利益和普遍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sup>[32]</sup>在政党之“政”维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有志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大党”,如何在理论与实践调节好“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互契张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是党性与人民性的互契张力。党性是政党阶级性的最高表现,人民性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体现,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长期实践与理论探索中不断调节“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张力,坚持“党

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以“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成为整合社会、建设国家的主导力量。但正如在“大党”的代表性难题中所提及的那样,“大党”的代表性不仅仅要在政党理念上加以体现,更要在实际行动中加以实现与维护。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民性之间也会“存在局部性、偶然性、阶段性的不统一现象”,<sup>[33]</sup>二者之间的互契张力依然存在,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在实践中妥善调控党性与人民性的互契张力,保持二者的统一。二是“大党”内部在长期执政中可能会再分化成若干“部分”,使“大党”面临异化为“与整体相对的部分”的潜在风险。首先是在长期执政中存在行政性钝化“大党”政治性与代表性的可能。在长期掌握国家权力的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习惯于运用国家权力开展政党活动、进行国家治理,容易使“大党”部分组织行政化、官僚化,进而钝化“大党”鲜明的政治性与代表性,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党”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sup>[34]</sup>其次是“大党”内部存在利益固化的可能。由于长期掌握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大党”内部极易分化出形形色色的特权阶层或既得利益群体,不仅会使得“大党”内部、“大党”与人民之间产生一定的间隙与疏离,同时也容易延宕、阻碍“大党”推行必要的改革。再次是存在被外部权力异化的风险。一些“大党老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政党自主性被外界某些权力逐步侵蚀,最终成为社会个别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从“作为整体的部分”转变为“与整体相对的部分”,走向了社会整体性利益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在长期执政且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同时,警惕政党被外界权力所异化,尤其是要“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sup>[35]</sup>

(四)政党之“治”维度的特殊性:超大规模政党的严格治理

中国共产党的超大政党规模造就了其其世界范围内也是“绝对大党”。正如“规模”具有双重面向,超大政党规模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表现为

强大的规模优势,但也会带来“政党规模治理难题”。因此,就政党之“治”的维度视之,中国共产党的“大党独有难题”便是在综合“党员数量较多、党内阶级阶层复杂、组织规模较大、机构设置较为繁冗等”<sup>[36]</sup>诸多特点的基础上,如何使政党规模与功能形成和保持内在一致性与同步性,从而实现超大规模政党的严格治理。

一是超大规模政党内部构成要素具有较强异质性。从复杂性系统理论来看,治理规模的扩大会提升治理混沌效应发生的可能性,而治理规模变化从要素数量和异质性上提高了治理的复杂性。<sup>[37]</sup>就“大党”而言,超大规模政党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政党理念、规范所不符的异质性要素也难免会被引入或逐渐增殖。首先是党内思想多元,共识形成难度大。政党规模在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所吸纳的党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参差不齐,同时“社会多样化发展使人们思想多元化、复杂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必然增加党内统一思想难度”。<sup>[38]</sup>其次是利益矛盾增多,协调统一难度大。在超大规模政党内部,也会“存在大量思想问题和利益矛盾,某些矛盾涉及党员、干部多,同其他社会矛盾错综交织,协调处理难度很大”。<sup>[39]</sup>再次是失范行为较多,规范难度大。庞大的党员队伍中难免会存在一些动机不纯、理想信念动摇、纪律性不强的党员,部分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更会在个人精神懈怠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产生严重的失范行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腐败。二是超大规模政党组织管理成本控制问题。首先,党内利益性“非正式组织”产生的“小团体主义”容易分散政党组织权力、权威。庞大的组织成员数量会产生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必然会增加有限的组织资源分配压力,从而造成党员对党组织权威的分散。<sup>[40]</sup>超大规模政党不同程度存在与组织目标、规范和整体利益不一致甚至相抵触的“小团体”等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在积聚到一定程度后会使得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sup>[41]</sup>从而不利于党的团结与统一,削弱党中

央权威并降低集中统一领导效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对党内“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治理的主要原因。其次,超大规模政党组织结构增加了组织管理负担及成本。中国共产党的特殊组织结构在客观上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如庞大的组织体系及其机构产生了较大的政治运行成本,同时党员队伍庞大,党的基层组织宏大、分布面广,客观增加了党内管理的难度。<sup>[42]</sup>除此之外,超大规模政党想要完成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组织运行发挥实效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党的规模扩大会对党内制度的刚性带来挑战,因此如何强化制度执行,避免党内潜规则对“大党”治理带来的挑战,也是超大规模政党必须重视的难题。<sup>[43]</sup>

#### 四、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可大可久之政治”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共产党如何寻求并掌握“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又是通往“可大可久之政治”的基石。在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中,价值建设、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构成了其核心内容与关键举措。<sup>[44]</sup>站在这一角度,在实现中国文明意义“可大可久之政治”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破解之道就具体体现为由原则、价值、组织与制度等维度构成的“四大治道”,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遵循“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内在要求;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引领,体现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以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强化组织保证,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以坚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增强制度保障,明确现代制度权威。因此,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实质是以“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与根本原则为统领,围绕“价值”“组织”与“制度”而展开。

(一)根本原则遵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欲以实现的“可大可久之政

治”，其最本质特征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了政党中心国家治理模式的新发展，创造了大党与大国治理的新经验。<sup>[45]</sup>就此而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内在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超大国家与超大社会的要求与机制，构成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统领性原则。

一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所在。<sup>[46]</sup>在超大政党维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根本原则体现为政党中央组织具有高度的组织权威，能够实现对“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塑造了组织权力自上而下集中并高度一体化的政党组织形态，而党中央权威的至上性有助于保持“大党”各级组织与党员能够在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确保较高的工作效率，从而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实施领导活动。<sup>[47]</sup>应当指出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大党”的领袖地位是内在统一的。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当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捍卫“两个确立”，从而为有效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保障。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功能效用不仅仅局限于“大党”内部，还具有重要的“外溢”效应。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大党”自身的有机团结与高度统一亦将推动超大国家与超大社会的有效领导和有效治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百年历史经验时强调：“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sup>[48]</sup>二是推进与落实党对国家政权的全面领导。为应对超大国家的治理规模及其治理焦虑，中国共产党基于“党建国家”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全面嵌入国

家政权之中以实现全面领导，由此衍生出若干政治原则、制度机制与治国技术，如党委制度、党组制度、归口管理制、党管干部制度、党管意识形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此外，“大党”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有效合作与民主协商，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实现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体现奋斗目标的一致性”“促进决策施策的科学性”以及“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等显著优势，<sup>[49]</sup>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综合与稳定的应对之策。三是在组织社会进程中推动有效整合社会。在超大社会维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根本原则表现为党通过不同的整合战略、策略凝聚社会力量、支撑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大、严密的组织网络体系已深度嵌入中国社会之中，形成了以己为“强轴心”、以广泛的外围组织和工作体系为“大外围”的“轴心—外围结构”，<sup>[50]</sup>从而极为有效地动员与整合了社会力量与资源。当然，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角度出发，“轴心—外围结构”这一“同心圆式”的整合社会战略，仍需根据社会发展以及提升长期执政能力的要求不断改进具体的整合策略，即以党的基本组织建设为核心，强化党的领导、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确保“轴心”对外围组织与社会的有效领导与有力支撑；重视开发党的外围组织并加以赋能，向内将多元利益要求等综合后传导至“轴心”，向外则将党的整合要求传递至外围组织各自所联系的社会基础；着重优化党对社会组织的整合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党与新兴社会组织的制度化联系，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另一方面应重视引导社会组织发挥各自功能与优势，助力“大党”治理超大社会，构建一核多元治理格局。

## （二）价值引领：坚持人民至上

回顾与总结世界“大党老党”历史，“民心向背”是其能否实现“可大可久之政治”的核心规律与关键标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秉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不仅契合了马克

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而且促成了现代政党责任伦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有机结合,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此而言,“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立场与实践方法,应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取得一致体现。

一是创新发展党的思想理论,实现政党秉持的政治规范价值与人民所认同的价值之间的内在一致。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政党纲领与理论中深度融合“人民话语”、秉持人民立场,极为有效地动员了广大人民,同时为确立与保持政党合法性奠定了价值基础。但也应看到,社会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社会利益分化等现实因素,考验着“大党”意识形态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作为信仰型“大党”,中国共产党应继续以强大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理论创新能力,不断回应现实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回答“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增强政党理论旗帜的号召力,凝聚起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二是真正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制度机制。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工作路线,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等重大问题以及基本领导方法。但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大党”脱离群众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以党的群众路线化解“大党独有难题”不应仅停留于清谈或空谈层面,也不应将群众路线仅作为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或领导艺术与领导方法等技术问题,而是应当注重“从根本的制度设计上将群众路线具象化、标准化、可操作化”,<sup>[51]</sup>健全与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机制。三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执政有效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党”若要维持与巩固长期执政,应当达成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的高度统一,在政治实践中取得与人民认同的内在一致。“大党”执政有效性是“人民至上”价值伦理在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果中的有效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推进决策有效性,在政策过程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丰富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

实践,实现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注重制度有效性,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依法执政”,既要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也应当提升依法执行国家制度的能力;体现治理有效性,满足人民越来越高涨的善治和提供优质公共产品要求,让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着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 (三)组织保证:坚持党的自我革命

破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之核心,就在于塑造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世界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兴衰成败业已表明,实现“可大可久之政治”关键在于执政党自身能否保持健康有力的组织机体。正因此,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命题,就在于“如何防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sup>[52]</sup>“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sup>[53]</sup>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sup>[54]</sup>严格政党治理,持之以恒地探索组织自主优化机制,从而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是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自我革命不是一般组织实施的管理活动,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先锋队的政治属性不仅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超大规模,同时也决定了超大规模政党的自我优化与自我革新应当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从而与一般组织管理或其他类型政党的建设相区别。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体现在“大党”全体党员必须坚定政治信仰、坚持政治领导、提升政治能力,同时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要与政党组织内部权威的形逻辑相互耦合,即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党的自我革命是政党组织的“自我优化”,核心在于增强政党自主性与适应性,如果没有强大而集中的政党中央组织权力权威加以推进,这一组织系统优化便难以长期、

全面地实施。二是坚持反腐肃贪重点问题治理。治理超大规模政党,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也要抓住重点问题,从而以“重点”带动“全局”。“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sup>[55]</sup>腐败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党”自我革命中最突出的议题,也是“大党”长期执政中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针对反腐败斗争这一重点议题,仍需坚持系统思维,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也要善于“抓关键”,坚决防止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破除特权思想与特权行为,从规范权力运行的“关键向度”压缩腐败空间,坚持“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这两大跳出历史周期率“答案”的衔接结合,“从人民和党自身的双重角度形成一个权力监督制约的完整闭环”。<sup>[56]</sup>三是严格马克思主义政党过程治理。以“大党”过程治理,增强“大党”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党的自我革命是“大党”秉持永葆政党先进性纯洁性价值目标,进行自主控制、自主调节与自主优化的动态过程。这就要求“大党”应当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进行全过程全环节的严格管理,积极建立明确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教育与实践机制、竞争与激励机制、评价与监督机制等,在施予动态压力的过程中培育党员个人的自我管理意识与能力,同时也在有序“输入”与“输出”的良性循环中确保“大党”组织系统的生命力。四是推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三型政党”深刻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即“大党”以自主学习提高更新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以服务确保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创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因此,“三型政党”始终体现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二者都有助于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sup>[57]</sup>应当指出的是,锻造全面先进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大党”本身的“可大可久”并非最终目的,其根本价值在于实现政党理想、满足人民期望与引领国家

发展,因此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实现“政党良治”“国家善治”与“社会长治”的有机统一。

(四)制度保障:坚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实质是要有效解决“大党”在国家发展与政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长期性与全局性问题,而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sup>[58]</sup>能够“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治理力量而存在”。<sup>[59]</sup>中国共产党应持续推进党和国家制度的战略性、整体性、结构性与有效性建设,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科学合理、严密有效的制度保障。

一是推进党和国家制度战略性建设。“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离不开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构想”与“战略推进”。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其对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认识与实践有着一个长期过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前期制度建设经验与教训的积累下,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上升为“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sup>[60]</sup>的战略问题。进入新时代,政党制度化与国家制度化进程加快。在党的制度化方面,尤为注重党内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sup>[61]</sup>在国家制度化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制定了总体目标。故而,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和国家制度战略性建设,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连续性、长远性的制度方案。二是重视党和国家制度整体性建设。制度“碎片化”无法为“大党独有难题”的破解提供有效治理力量,因此要引导党和国家制度走向“集成化”。在这一层面,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较为突出的进展,如党的制度建设从强调克服某一重点问题逐渐建构起党的制度体系,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相互配合,党的制度建设中“是什么”层面的实体性制度与“怎么办”层面的程序性制度相互配套;<sup>[62]</sup>而国家制度建设也从

侧重某一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渐“把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方位、整体性制度建设”。<sup>[63]</sup>三是优化党和国家制度结构性建设。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也应当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统领性原则。一方面,要以党的制度建设引领国家制度建设。强大国家需要强大政党,强大政党需要严密制度规范,党的制度建设势必将为国家制度建设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这就要求应通过党的制度建设的完善创新,为国家制度建设创造更广阔空间、注入更强劲动力;另一方面,以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统领国家制度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中,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领导制度”,统领着整个制度体系。因此,“大党”应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确保党的领导能够落实到治国理政各领域各环节之中。四是重视党和国家制度有效性建设。只有形成“长效制度”,方能切实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这一“长期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党和国家制度战略性、整体性与结构性建设,并不能“自动”或一劳永逸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关键在于推动制度建设从“于法周延”走向“于事有效”。因此,应强化制度意识,树立制度权威,提升“大党”各级党组织以及党员的制度执行力,着重增强党员干部运用党和国家制度进行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释放制度正向效能与优势。需指出的是,在进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避免制度“繁复”,注重开发制度功能,即“很好地开发制度本身早以确立的各种功能”,<sup>[64]</sup>而这些功能可能还未被完全释放出来。此外,还要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性,如“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sup>[65]</sup>党的精神谱系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能够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党和国家正式制度提供有益补充。

注释:

[1] 参见范勇鹏:《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统

一性》,《复旦政治学评论》2020年第1期。

[2] 谢茂松:《中国共产党的三重文明意义:文明型政党、形塑新文明、成为新文明》,《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

[3] [64]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3、441页。

[4] [24] [34] [54] [5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3、22、14、14、69页。

[5] 参见《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602947。

[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

[7] 参见姜崇辉:《“大党”与“大党治理”问题探析》,《理论月刊》2008年第5期。

[8] 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党员人数已过千万,但其入党程序十分简单,成为其选民即可为党员,入退党十分自由;再如印度人民党曾发起一系列招募党员活动,只要拨打一通电话,就可以直接入党,而无论是网络平台或是街头的实体摊位都可以直接登记,因此印度人民党规模扩大得十分迅速。参见《印度人民党党员将超1亿 打电话就可直接入党》,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12\_03\_302294.shtml。

[9] 王长江、姜跃主编:《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导言”,第4页。

[10]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6页。

[11] 参见周淑真、孙润南:《比较视野中的百年政党:历史演进、类型特征与兴衰关键》,《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12] 在这里,本文未引入“功能”这一向度,一是由于“功能”向度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难以进行统一衡量;二是这一标准常与人们常识中的“大党”相抵牾,如一政党功能强大但是规模却小,似乎难以称之为“大党”,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中实现了所谓的“小邦大治”,但是其政党规模十分小。

[13] 周淑真:《政党政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1页。

[14] 王韶光主编:《政党政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15]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7页。

[16] [36] 姜崇辉:《大党治理》,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130、40页。

[17] 参见王绍光:《中国·政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王绍光教授将党员人数越多,政权垮得越快的现象称之为“罗马尼亚悖论”。

[18] 赵晓呼主编:《政党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

[19] 王长江:《政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20]徐世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21]参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22/06/29/ART11656486783270447.shtml>。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03页。

[23]齐卫平:《政党治理视角下执政党组织规模问题的思考》,《江汉论坛》2014年第7期。

[25]周雪光:《国家治理规模及其负荷成本的思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6]参见韩志明:《规模焦虑与简约治理——大国治理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27]唐皇凤:《使命型政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8]参见李海青:《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29]姚中秋:《领导权:基于中国实践的权力类型学研究》,《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1期。

[30]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陈明明教授就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正促使革命型现代化转变为市场型现代化过程,党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权的实现就取决于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重新确立符合现代政治文明潮流的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参见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31]参见郭静:《政党的政治性分析:西方政党类型学祛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3-41页。

[32][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8-99页。

[33]严静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哲学寓意》,《思想教育》2016年第2期。

[35]王建新:《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中新网,<https://www.chinanews.com/gn/shipin/cns/2022/10-24/news941190.shtml>。

[37]参见赖先进:《治理规模、时空比较与规模缩放效应——基于治理规模指数(GSI)的比较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第8期。

[38][39][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108页。

[40]参见张伟:《大党治理的规模要素:科学内涵与机制评

价》,《理论导刊》2021年第1期。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42]参见郭亚丁:《政党差异性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比较》,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112-113页。

[43]参见郑寰:《什么是大党独有难题》,《学习时报》2022年11月7日。

[44]参见唐皇凤:《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45]参见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46]参见郭祎:《党的团结统一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探索》2022年第6期。

[47]参见张振、杨玉斌:《新时代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探赜》,《学术界》2021年第10期。

[48][5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5、100-101页。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8-20页。

[50]参见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206页。

[51]陈培永:《什么是人民、阶级及其他:以马克思的名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

[52]刘红凇:《从世界政党百年沉浮看大党独有难题》,《人民论坛》2022年第21期。

[56]王高贺:《跳出历史周期率:把握“两个答案”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5日。

[57]参见张振:《试论“三型政党”的整体性及其价值》,《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58][6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59]林尚立等:《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9页。

[6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页。

[62]参见李玉荣:《新中国60年党的制度建设的回顾与思考》,《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63]肖存良:《引领与契合:党的制度建设与国家制度建设相互关系研究》,陈明明主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逻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0页。

[责任编辑:刘 鏊]